

“中国式”日本研究的
实像与虚像

——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

刘岳兵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式”日本研究的 实像与虚像

——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

刘岳兵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 / 刘岳兵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 - 7 - 5161 - 5822 - 7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日本—研究

IV. ①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392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李 林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a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出这本书，简单地说，想要表达的意思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回归原典”。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常识，但是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要很好地实践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尽管这些年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这样呼吁过，但人微言轻，应者寥寥。趁着自己热情未减，再做这样一次努力，其目的，亦不外乎“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呼声如能遇着知音，一同为之奋进，自然是好；或者只落得个为自己壮胆，也无可奈何。

“回归原典”，或者说“从原典出发”，是一种指导思想，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说得更根本一点，甚至还是一种人生态度。不老实地研读原典，断章取义，就是投机取巧。

忽然想起20年前诗人洛夫在为我的诗集《飞回古典》写的序文中所强调的“古典精神”，感觉自己浪荡了这么多年，原来从未离开过这个母题；原来自己不惜将最旺盛的研究生命的一部分交给这些文字，就如同20年前将最美好的青春消磨在经营那无人问津的“飞回古典”的梦想上一样。这样想过，反倒释然。遗憾的唯有不能将那些重复的文字变成诗一样的反复咏叹，且容我将其作为不同场合的见证保留下来，请读者谅解。

副标题中的“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的学术传统”的想法是2013年7月初应吴光辉教授之邀在厦门大学讲学时明确起来的。即便以“相关”加以限定也仍觉有些大言，自知惭愧；但自信此非虚言，更非妄言，亦可坦然。将近年这方面的工作，戴上这样一个“高帽子”，是否合适，请读者批评。如果还算离题不远，则希望在这“初步的考察”之后，即便不是我，也能够有人来做更“深入的研究”。

2013年8月26日于鱼鳢堂

2015年1月12日定稿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编 “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关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	(3)
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看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若干问题	(7)
“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对中国学界反思自身日本研究得失的一些观察	(19)
日本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感言	(39)

第二编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种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	(57)

第三编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	(117)

第四编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典型个案分析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 30 年	(157)
----------------------	-------

新世纪的神道研究及其他

——《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以神道为中心》编者的话 … (162)

同情及其界限

——重读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 …… (169)

未名庐学记：卞崇道及其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管窥 …… (174)

“日本马克思主义”：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回望 …… (186)

补编 作为“他者认识”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如何可能

作为“他者认识”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如何可能

——回顾中国日本研究的相关方法论问题有感 …… (197)

附 录

刘岳兵教授的近代日本儒学研究

——评《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日本近代儒学研究》

及《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 …… 吾妻重二(215)

中国日本学研究推出通史性日本思想史著作 …… 徐凡(220)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第一本通史性著作

——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讨论会

综述 …… 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223)

“理论之后”的日本思想史研究

——刘岳兵博士《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述评 …… 吴光辉(229)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读刘岳兵著《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三卷(1840-1895)》

有感 …… 白春岩(236)

人名索引 …… (243)

后记 …… (255)

第一编

“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无论是要“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也好，还是希望中国“成为研究日本史的强国”也好，我相信，日本史研究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的其他国别史研究一样，如李剑鸣所言，“史料依然是制约世界史研究的‘瓶颈’”。不在“原典日本”的解读与翻译上下功夫、不在建设系统的中国日本史史料上下功夫，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或国家，我们的日本史研究都难以深化。

关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

写历史，总难免挂一漏万。写近现代史，可以用的史料更多，尤其如此。一本历史著作写出来了，我不知道别的作者的心情如何，在我自己，无非是增加一次面对公众反省自己无知的机会。有时候，挂一漏万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一些乖巧的“历史学家”便制造或利用各种“理论”作为遮羞布来冠冕堂皇地掩饰自己的无知。在历史研究中，由于理论先行所引起的许多论争、发表的许多论著，极而言之，不论“好事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其出发点就决定了他的“研究”不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而只是掩盖历史的真相；他的“成果”也称不上“历史著作”，只不过是“对我执”或“妄念”的一个注脚。史学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其解释史实范围的广度和阐发历史进程之所以然的深度。一旦离开与史料的真正的肉搏和对史实的辩证，任何史学理论的生气都将丧失殆尽，也很难再发挥任何积极作用。没有万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史学理论。这样僵化的理论即便被抬出，或许可以一时蒙蔽读者的耳目，但是历史终究会揭穿其面目。在历史研究中，理论先行的做法是探究欲衰退与投机欲增强的表现。

这样说，并非一概否定“理论”的重要意义，只不过是在史实与理论的权衡之间，表明一种最原初的态度而已。这种态度是无关紧要还是至关重要，不是在这里可以三言两语讨论得清楚的。好在“历史”也是“宽容”的，即便是那样的“理论”，即便被揭穿面目，也可以构成“历史”的一分子而成为一种新的史实，既然如此，就可以说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参与了“创造”历史的过程。因为“历史”本身毕竟也不可能就是

* 载《读书》2009年10月号。发表时有删节。后作为“前言”收入拙著《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像任何一部“历史著作”所描述的那样“真实”。

有些人埋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缺乏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自觉，与国际历史学界流行过的诸如美国的“观念史”、英国的“剑桥思想史”学派以及一些新兴的研究“范式”都联系不上，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这或许不无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而我更加关注的是，对中国日本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最起码的“专业化要求”还有待加强。所谓日本学研究的“专业化要求”，主要是指“专业化的态度”和“专业化的训练”。所谓专业化的态度，就是首先要有把日本学“纯粹地作为学术”来研究的态度，而不是在出发点上就将日本学作为寻找启示或总结经验的手段。所谓专业化的训练，就是要独立地掌握能够客观地研究和分析日本这一研究对象的各种基本技能——当然包括日语的学习——与方法，而不是在出发点上就将日本学只是当作与别的研究对象相比附的存在。应这种专业化要求所需，我依然认为，为了提高中国日本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以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而全面地认识日本，系统的、可靠的、必要的知识或常识的介绍以及基本文献的翻译，比竞相出版大部头的所谓“研究”论著，更是我们今天日本学建设的当务之急^①。如果基本的历史叙述工作做得尚不扎实，便炫之以各种外来流行的理论或研究“范式”，那一定会出现百鬼夜行、鸡犬不宁的局面。

我为自己不熟悉各种流行的史学理论或研究“范式”而汗颜，但同时，我也为自己没有先入为主地照搬任何理论、套用任何范式而欣慰。

在日本近现代史中，“明治维新”、“大正维新”、“昭和维新”以至于“平成维新”的呼声不绝于耳，其社会、政治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复杂的社会变革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日本与世界（当然也包括日本与亚洲）、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日本固有的传统思想与信仰以及被日本化了的儒学、佛教，与大量涌入的近现代西方各种思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日本这个国家由东亚一隅的岛国通过所谓“脱亚入欧”而膨胀为“大日本帝国”，再到力图在国际社会中寻求一“普通国家”的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国体”意识与国家战略；以及在上述历史状况下，作为“日本人”（“臣民”或“国民”）

^① 参见拙著《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序言”，三联书店2007年版。

或作为生命的个体（“自然”或“精神”意义上的）应该如何生存、如何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成为梳理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主要线索。

《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作为一本“历史著作”，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近现代思想发展的“历史”的“真实”，当然也是一个问题。这里的“思想”主要是从作为“理论形态结晶”的狭义思想史的意义上着眼的，但是，比如在论述昭和时代的“超国家主义者”的人生观、国家观、宗教观时，也涉及一些没有理论化的情绪性方面的内容，这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表现。从主观上说，我是力图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梳理和解读，去展现思想史所蕴涵的丰富性和各种可能性。比如，对于明治维新这场社会变革，本书一方面提到“不同的解释的共存，不仅可以加深对解释对象本身所可能蕴涵的丰富意义的理解，而且也展现出解释者所处时代的创造力与包容力”。另一方面，指出“如果因此而忽视这场社会变革的戏剧性、探索性和妥协性，而仅仅以一个简单的历史必然性来概括的话，那么也无异于以一种既定的历史现实去掩盖这种现实背后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可能性。这样的思想史也就容易陷入对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粉饰与追逐”。

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只是提到而未能很好地展开。比如日本的传统思想与流入的各种近现代西方思想的冲突与交融问题。虽然近年来一直关注传统思想中的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发展形态及其与近现代思想的关系问题，但是在这本书中没有更多地论及。如果说在这方面主观上有有意回避的意向，但是对佛学在近代日本的发展形态及其与近现代思想的关系问题没有深入论及，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功力不逮。但是我觉得研究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这样一种视角是很有必要的。

还有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中国经验”的问题。这里的“中国经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反思并从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意义上的“中国经验”（实际上是一种“中国认识”或“中国观”），将这种“经验”作为一种“方法”来与日本进行比较，并阐发其意义，这已经为竹内好等思想家所关注，这种阐发本身也构成了日本现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可以指近现代史上日本人是如何将他们在中国的“实际体验”转化为其自身以至于整个近现代日本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的；或者日本人是如何将他们在当时所寻找到，或挖掘出的中国思想“经验”加以利用，并使之转化为当时日本

的思想资源的。从后者来看，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探讨。

第一，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传统思想派别中的中国经验。比如在明治时代以来出现的以复兴和倡导“孔子教”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家的中国经验就很值得研究。服部宇之吉在京师大学堂的经验，很多人研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积极贡献，这固然重要。但是这一经历对他倡导“孔子教”的影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如何被日本的农本主义者利用的；比如日本的右翼分子是如何利用汉奸的言论为其“王道”思想做宣传的，等等，都属于这类问题。

第二，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思想和民主主义者的中国经验。内田良平、北一辉、井上日召、朝日平吾等大大小小的人物都有着各自独特的中国经验；大正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不仅拥有非同寻常的中国经验，而且留下了有关中国方面的论著。这些经验对他们的思想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三，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中的中国经验。野坂参三的延安经验、中西功战后“民主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政策的关系、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很早就已经成为日本战后思想史研究的课题，这由日本某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礼赞者”据说甚至喊出“将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日本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口号可见一斑。

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中国经验或中国因素，不仅可以增加一个观察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新视角，丰富思想史的内容，而且通过中日近现代思想文化交流史中的这种“交融性”来深化其交流的“双向性”，可以突破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些固有模式，同时也可以增加一个观察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参照系。

总之，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所谓挂一漏万，对我来说，不是难免，而是必然。如果这本“历史著作”能够从一个侧面为读者理解近现代日本的历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深入思考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传统与现代、日本与世界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思想问题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线索或素材，那么这种挂一漏万的工作也可以算是没有白费了吧。

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看近代 中日关系史的若干问题*

在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探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之前，我想首先思考一下所谓的关系史的要素。两国或者多国间的关系史，这一研究领域极其宽泛。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一国与一国之间如果具备某种联系，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什么关系的话，其所有的现象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但是，无论是何种复杂的关系，如果具体地分析，其要素无外乎就是包括：相互间的认知、交流以及影响这三种。相互间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关系的前提，对于关系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相互间的认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或所受影响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同时，基于新的相互认知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交流，又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而这正是研究关系史的魅力所在。毋庸赘言，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相互认知的路径在不断多样化。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和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在两国间的相互认知上直接发挥作用，其对于中日关系史而言责任重大。

于此，我想从2006年1月由岩波书店出版的《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1799—1949）》说起。

* 本文是在两个讲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中，一篇是应早稻田大学岛善高教授之邀，于2007年7月18日在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所作的演讲《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看近代中日关系史》；另一篇是2007年10月19日在庆应义塾福泽研究中心所作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中的若干问题》的演讲。在此，谨向早稻田大学岛善高教授、庆应大学岩谷十郎教授、西泽直子教授，以及大妻女子大学井田进也教授，还有帮忙修改了本文部分日语表达的南开大学外国专家井上亘博士表示感谢。相关内容，请参阅拙著《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的序言部分以及收录其中的论文《梁漱溟的著作在日本的影响》、拙稿《叶德辉的两个日本弟子》（《读书》2007年5月号）。

一 《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1799—1949)》 遗漏之处

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整体情况，该年表的“前言”做了如此说明：“虽然近代的日中关系以对立为主流，但同时，也存在着以一种由横亘两千年的交流所产生的共通文化为背景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关于编辑方针，则做了如下描述：“日中关系史年表不多。而且，都以政治、外交关系为主。但是，如果将除政治关系外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关系，甚至将在敌对国家框架下无法完全把握的人际关系也包含在内的两国各领域的历史事实置于日中关系史中加以定位的话，也许能够发现新的历史面貌或意义。同时，也能够反映出上述的那种对立与相互依存的关系。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制作了本年表。”^①附录的《典据文献一览》还列举了中日两国的著作文献合计近千种。可以说，这是迄今该领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但是，如果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尤其是“社会·文化”一栏，虽然极具开拓性，但还是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实被忽略了。

下面，本文拟从这些被忽略的重要历史事实中举出几例进行探讨。毫无疑问，在有限的时间内重新认识“近代日中关系史的整体情况”是不太现实的，但是笔者相信，通过下面的这些事实至少可以明确近代中日关系史的某些侧面。近些年来，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令人担忧的状态”，为了有助于“加深相互理解，在承认分歧的同时，构筑一种从对立到协调的并存关系”^②，与其急于将不完整的“历史事实”在“日中关系史中”进行“定位”，还不如首先更多地全面发掘出历史事实，并直面这些事实进行相互探讨。本文所做的尝试便是试图通过这种发掘与探讨以便有助于产生“确切的认知”。

《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1799—1949)》附有精美的腰封，其上夸张地写着“展现了长达150年的日中交流史的全貌”（请注意交流史只是关系史的一部分）。商家为了营销进行这种宣传自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是以历史

① 近代中日关系史年表编辑委员会：《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1799—1949)》“前言”，岩波书店，2006年，第3页。

② 同上。

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与其这般自夸，倒不如采取一种谦虚的态度为好。

二 《殷鉴论》与《邻草》——从思想史的角度探寻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原点

《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1799—1949）》“前言”谈道：“日本将中国的状况作为它山之石来应对西欧的近代，也参与了对华的帝国主义侵略”，大致而言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对此，本文拟列举二例来具体探讨作为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原点的、可称为“它山之石”的意识。

例一：古贺侗庵的《殷鉴论》（1813年）

1882年10月，古贺侗庵（1788—1847年）的《殷鉴论》^①出版。古贺家为幕末典型的儒学世家，侗庵之父乃是宽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贺精里（1750—1817年），其长子茶溪（1816—1884年。名增，称谨一郎）继承了家学。侗庵的《殷鉴论》收录于《侗庵初集》卷九，推定为文化10年（1813年）所作^②。

《殷鉴论》“序”（侗庵）：

唐人之书传于我者，不止五车三万轴。书中所载，嘉言懿行、善政美事不为少。舍其短而取其强、嘉其善而察其恶，不拘成迹、不牵陈言，此真善学者也。况圣人礼从宜、使从俗，生于斯邦、行斯政，必应因俗设教、损益古训，以成一代之盛治，岂汲汲乎效彼哉。予有见于此，作殷鉴论十篇，以谏（《说文解字》：谏，深谏也。——引者注）学者。予性肮脏，言每过于激，此论近于裂眦骂詈，盖性习之失，不能自掩，览者谅焉可也。方今文教清明，自称为夷、目彼为中华中国之非，人或辨之是也。然此尚其末者耳，故予舍旃，而独于政化民风尤致意焉。顾此论专谏学者，故惟论唐人之失，而未及本邦。本邦仁政礼俗，即度越齐州万万，其损益因革之宜，亦多可言者，将俟异日而论之。殷鉴不远之语，诗取时代近者（《诗经·大

① 竹中邦香编《天香楼丛书》第四册，东京士族竹中邦香出版，1882年。

② 真壁仁：《德川后期的学问与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参见第228、637页。

雅·荡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夏的灭亡对殷而言乃前车之鉴。——引者注），以为炯戒。予则借以指本邦与齐州地不相远云。^①

《殷鉴论》的具体内容中，有如下句子：

世之儒先，自幼迄老，沈酣唐人之书，阿其所好而不觉其弊。

唐人之不义无道，可恶可畏，万万不及本邦君臣上下仁而有礼也。

唐人拘于末节而不明于天下之体。

唐人有华而无实，饰外而不修内，多虚喝夸诞之意，而乏忠厚敦笃之心。^②

对于在新的时代为何还要刊行此部《殷鉴论》，出版人竹中邦香在其“跋”中是这样解释的：“中国国势不振者，原于尊大自处，非使其自知其非，则言不可入，交不可久。今日之形势，非我与中国为唇齿，则不能兴国益，宜规切之以示善邻之宜。乃设善邻义会，立五规则，将刻此篇，以颁同好。”^③

古贺茶溪在《殷鉴论》“序”中（1879年6月）也如此写道：“……我邦儒先依然守唐山旧说，不知所取舍，并其敝风陋俗，亦尊崇过当，贻害弗少。先人当日深为国家忧，终草本论，将大声疾呼，醒世间人之大迷，故其言时似涉过激，救世之念，势不得不出此。在读者自知耳。然世之好尚逐年变迁，国之敝害随时不同。今日世人之轻侮唐山事，殆与昔日为反体之观。白面小生妄取圣经贤传诟骂，绝无所忌惮。使先人见之，其所忧或甚于当日者乎，论之必有激于本论者乎，诚未可知。而今则已矣，是独可惜也。”^④从当时的中国观、汉学观^⑤来看，这样的言论并不稀奇。

① 古贺侗庵：《殷鉴论》“序”，竹中邦香编：《天香楼丛书》第四册，东京士族竹中邦香出版，1882年，第1—2页。

② 同上书，序文第1页、正文第7、14、17页。

③ 古贺侗庵：《殷鉴论》“跋”（竹中邦香），竹中邦香编：《天香楼丛书》第四册末页。

④ 古贺侗庵：《殷鉴论》“序”（古贺茶溪），竹中邦香编：《天香楼丛书》第四册序文首页。

⑤ 请参考中村敬字《中国不可侮论》（载《明六杂志》第35号，1875年5月）、《汉学不可废论》（载《东京学士会院杂志》第9编第4册，1887年5月8日讲演）等。以上文章均收入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明治文学全集》3），筑摩书房，1967年。

非常有意思的是，此部《殷鉴论》原本不仅仅是为了明辨当时的日本人“自称为夷、目彼为中华中国之非”，也是为了彻底谴责“唐人”的“政教民风”而写。但是，时代变了，大概在70年后将该书再版问世时，目的却是为了防止轻侮中国，即茶溪所谓的“今日世人之轻侮唐山事，殆与昔日为反体之观”。但是，其最终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日本的“国益”（国家利益）。这一点，无论时代如何改变，都是不变的。

例二：加藤弘之的《邻草》（1861年）

加藤弘之的《邻草》“实乃我国倡导立宪政体之最早著作，为此类文献中最为贵重者”^①。这也是学界的公认评价。实际上，《邻草》初稿的题目是《最新论》。取名《邻草》是源于蕃书调所的同僚西周、津田真道的意见。西周曾在初稿上用“朱笔”写道：“鱼人云、题名完全与本论不符。殷鉴新话似可。又若太过暴露，取邻草如何……”^②

对于该书，加藤弘之本人曾这样说道：“第一本著述是名为《邻草》的书。……我二十六岁时写的。什么内容呢，也就是立宪政体。西洋有立宪政体，一国之君、大臣等不专权，有下院上院即议会来议定国家的法律财政等的制度。……事实上，我本意是希望日本也实行那样的制度，但是日本的事不可以明确地写出来。因为不能写日本不行，所以要学习西洋，采用其制度来改善政治这类的东西。于是，就写‘中国’虽然以前很好，但是现在不行了，政治不公平。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衰落了，所以必须模仿西洋实行立宪政体。也就是说因为写的是邻居家的事情，所以才取名为‘邻草’，但本意还是改革日本。……在日本写立宪政体这是第一次。之前还没有一个人写过。”^③

《邻草》的最后部分这样概括道：“是故，清主回返北京，如旋即设公会、树上下分权之政体以施公明正大之政治，则下民皆怀其仁德，视朝廷如父母，万民相亲如兄弟，人和咸备，至是时……纵有外患内贼，决不足患；国家永保泰平、王室永保安全也绝无可疑。否则即便建造千万枪炮

① 下出集吉：《〈邻草〉解题》，《明治文化全集》第八卷《政治篇》，日本评论社，1992年复刻版，第3页。

② 《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岩波书店，1989年，第3页。

③ 《太阳》临时增刊《明治十二杰》，1899年6月，第66页。